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黄兴



## 一、早年时期

黄兴是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重要领袖。

黄兴原名叫轸（zhǐn），后来因为参加革命从事秘密革命活动，受到清政府的通缉，才改名为兴。1874年11月4日（旧历九月十六日），黄兴生于湖南善化县（今属长沙）的东乡。

黄兴的父亲叫黄筱（xiǎo）村，是湖南一个有点名气的读书人，在黄兴幼年时就死了。黄兴在少年时期也受过系统的封建教育。后来又进入设在武汉的两湖书院求学，继续受着系统的封建教育。

但是，就在少年时期，对于当时封建统治者来说，黄兴已经不是一个安分的青年了。汉族传统的民族主义，在他思想上有着深刻的影响。他的远祖在清朝初期曾写过遗书，要黄家的子孙永远不做清朝的官。黄兴自己很早就对同学说过：“我们求学，哪里是为了给清政府效忠，我们的目的，是要造成有用的人材，在将来为汉人扬眉吐气。”这是他思想上最初的叛逆种子。

当黄兴求学的时候，中华民族的独立和生存正遭受着严重的威胁。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朝政府的重重剥削与压迫下，处在极端穷困和痛苦的境地中。在这样极端危急的形势下，统治着中国的清政府不但不能保卫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反而变本加厉地执行对外投降的路线，大量出卖中国的主权，对内则实行黑暗的野蛮统治，镇压人民的一切爱国活动。这一切，不能不激起中国人民极大的愤怒。

武汉，当时是中国经济和文化上比较先进的地区，又是内外交通的中心要道，中外时局的消息和新的思想容易传入此地。当黄兴在两湖书院读书时，正值义和团反帝运动期间，帝国主义八国联军的攻占清朝首都北京和帝国主义强盗无耻的烧杀掠夺行为，都使黄兴感到极大的愤慨。同时，他又偷偷地读了卢梭写的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著作《民约论》等书，开始接触到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逐渐接受了某些资产阶级政治观点，思想更加激进。但是，当时他还对曾经赞助过戊戌变法的光绪皇帝存在着幻想。他曾参与保皇党人唐才常计划在武汉发动的勤王起事，运动清军中一部分湘籍军人在起事时保持中立。这是黄兴和军队的第一次接触。然而，唐才常的这次勤王起事还没有来得及正式发动，就被西太后破获，领导这次起事的唐才常等30多人，都惨遭杀害。这次起事的失败，使黄兴看到：依靠清政府，走改良主义的道路，进行改革是不可能的，从而日益倾向革命。从思想上更加接近革命，但是，在这个时期，他还没有参加实际的革命活动。

## 二、立志革命

1902年，黄兴从两湖书院毕业，被选派赴日本留学，进入在东京的弘文学院受师范教育。这是一所专为中国留日学生设立的学校。和当时的许多青年一样，黄兴把这次留学看作是直接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救国真理的良好机会。因此，黄兴把自己大部分精力都用在课外的学习和活动上，成为爱国留日学生中的一位活跃分子。他参与两湖留日学生创办的《湖南游学译编》和《湖北学生界》两杂志的工作；请日本军官讲授军略，利用空余时间参观士官联队及各地兵士操练；每天早晨起来，还到神乐坂武术会演习枪弹骑射。这个武术会的条例规定，凡开枪中靶子红心六次的人，可以得到银质奖章。黄兴射击术十分准确，因此，书桌抽屉中堆满了得来的奖章。

这时候，民族危机更为深重。孙中山正在日本从事宣传活动。一些比较早到日本、并且已经和孙中山结识的两湖留日学生，在新来的学生中宣传孙中山的反满革命的道理。他们介绍他人阅读记载清兵初入关时，大肆屠杀和蹂躏（l2n）汉族人民的一些书籍，如《嘉定屠城记》、《扬州十日记》及黄梨洲、顾亭林、王夫之等明末清初诸大儒的具有反清思想的一些著作，力图借此唤起人们对清朝统治者的仇恨，起来革命。但是，与此同时，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到日本的著名的保皇党人梁启超，这时也正在日本留日学生中从事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的宣传和组织活动。当时留日学生赞成梁启超的改良主张的，大有人在，弘文学院的学生中也有不少人向梁启超表示崇拜。这样，在留日的中国学生中，就渐渐分裂成革命和改良两派。弘文学院的中国留学生，几乎每天晚间都要在自习室里辩论革命和改良的问题。以后，主张反清革命的人渐渐地占了多数。黄兴在同学中一向笃实厚重，不多发言。但在他决定了自己该走的道路以后，意志就非常坚决。这时，他已认识到，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之所以不断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主要都是由于清政府对外投降，对内残酷地镇压人民的反动统治所造成的。因此，他觉得中国人民要想发愤图强，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就非先推翻清朝腐朽的专制统治不可。

有一天晚上，他和一些同学争论革命与改良的问题，争论得激烈，气得说不出话来，竟把手中的一个茶壶掷在地上摔碎，表示他已经下定决心从事反清革命，不是任何力量所能动摇的。

在义和团反帝运动期间，帝国主义的八国联军进攻中国时，沙俄出兵占领了整个东北。战后，按照协约，应该很快撤兵，但是，沙俄却始终迟迟不愿撤兵，企图永远霸占东北。1903年4月，原来协议的撤兵的第二期已到，沙俄仍然拒绝撤兵。许多留日学生都把这件事情看作帝国主义国家瓜分中国的起点，认为中国亡国的惨祸就要到来了。

黄兴在这一事件的刺激下，吐了许多血，经医生治疗十多天，方才渐渐好起来。他在病中慨然长叹：“中国的大局，破坏已到了极点。今后只有革命，才有挽救危亡的希望。”从此，他就积极地参加留日学生中一部分激进分子组织的拒俄义勇队、军国民教育会的活动。不久，黄兴就由军国民教育会派遣，以运动员的名义，回湖南策划反清革命的活动。

### 三、密谋举事

1903年夏天，黄兴由日本经上海回到湖北武昌，在两湖书院演说，指出必须改革国体、政体的理由，同顽固派展开了激烈的争辩，取得了许多听众的信服，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件事，使清朝湖北地方当局感到很大的震动，下令将黄兴驱逐出境。但是，他还是从容地分发了带回来的四千余件革命宣传品，然后才离开武昌，回到湖南长沙。

回到长沙以后，他就在明德、经正等学校担任历史博物及体操教员，从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宣传活动和组织活动。当时，明德学堂是一个颇有革命气氛的学校，教员中，有许多人是富有革命思想的，如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革命文人苏玄瑛（曼殊），就是当时的国文教员。黄兴这时已经剪掉发辫，在学校里常穿体操服。他的这种表现，在顽固的封建士大夫看来，自然是叛逆的行为。

黄兴常常利用课堂讲课的机会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有一天，他在明德学堂上博物课，双手托了一个大面盆走进讲台，盆里放了一条活的鲤鱼，开口就说：“今天讲鲤鱼跳龙门”。他先讲鲤鱼跳龙门的传说和它的科学道理，然后说：“鲤鱼终究还是鲤鱼，决不会成为龙的。只因造反的人，都想做皇帝，所以才捏造鲤鱼跳龙门的故事。历朝历代都是赶走一个皇帝，又来一个皇帝，对百姓来说，并没有什么好处。法国的革命党人就聪明一些，他们在革命成功以后，将政体改为民主共和，再不要皇帝了。”

黄兴在讲历史课时，也常常借用中国古书上的一些话，宣传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例如，他在向学生解释民权二字时，就不引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家卢梭、孟德斯鸠的话，而问学生读过《孟子》没有？他说：“孟子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就是民权思想。”可见，黄兴当时还是很善于进行革命宣传工作的。

在黄兴的宣传下，很多学生都接受了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思想，并且后来有很多人参加了华兴会，成为革命党人。

他在明德、经正等学堂进行宣传活动的同时，还在军队与会党中积极地进行联络和宣传工作。

11月4日，是黄兴30岁的生日。在长沙西区保甲局巷的一所住宅里，20多位朋友备了两桌酒席，以为黄兴祝寿为名，举行秘密会议，决定成立华兴会，从事革命活动，推举黄兴为会长。对外用办矿的名义，取名华兴公司。出席秘密会议的还有刘揆一、陈天华、宋教仁、章士钊、周震麟等。

1904年2月15日，华兴会正式成立。会员大多数为留日归国学生和明德、经正等学堂师生中的革命分子。

#### 四、第一次起义

华兴会成立后，黄兴立刻筹划武装起义，积极地从事印刷革命宣传品，制造炸弹，购置军械等活动。为了筹划起义的经费问题，黄兴出卖了在长沙东乡凉塘的祖上留下来的田产近三百石。后来，为了便于联络会党，他又成立了一个秘密的外围组织——同仇会，专门从事策动会党参加起义的工作。

为了发动会党参加起义，黄兴做了许多工作。当时，湖南哥老会的势力很大，哥老会的一个领袖湘潭人马福益在永州、长沙、衡州三府地区，有很大的势力，所控制的会党群众不下数万人。黄兴为了发动马福益参加起义，先派华兴会员刘揆一向马福益进行思想动员工作，待取得马福益的同意后，就亲自和刘揆一同去会见马福益，详细商讨起义计划。为了避开清朝官员的耳目，黄兴穿了短衣，着了钉鞋，头戴斗笠，乘雪夜走了三十里路，和马福益相见于湘潭茶园铺矿山的山洞中。他们燃了熊熊的柴火，促膝密谈，取得了关于发动起义的共同意见。回来时，黄兴十分兴奋，写了这样的诗句：“结义凭杯酒，驱胡等割鸡”。

马福益和黄兴会谈后不久，就在湘潭的雷打石附近的王龙山某寺，举行正式开堂。开堂后数日，黄兴派刘揆一拿着慰问信，并以白马一匹、酒肉和布匹若干作为礼物，前往慰问和鼓励。刘揆一到后，马福益热烈欢迎，待将礼物清点后，发现肉中有手枪两支、布箱中有长枪三支及子弹，就更加高兴。刘揆一教马福益如何使用手枪，并传达黄兴的指示，要他从速将会众编练成为作战部队，并尽可能使会党成员参加正规军队，准备在时机成熟时发动起义。马福益表示遵令照办。

此后，马福益即一方面选拔会党成员中身体强壮和有才干的，命他们统率会众，并经常于夜半在山林中举行军事演习；一方面自己经常骑马往来于浏阳、萍乡各地，进行组织工作，积极准备发动起义。

这次联络发动的面相当广，会党参加的约有二万人。他们起义的计划是趁阴历十月十日清廷慈禧太后“万寿节”（西太后六十岁的生日）那天，全省文武在皇殿举行祝寿时，预埋炸药于拜垫下，将他们炸死，乘势占领长沙作为根据地，并在岳州、常德、浏阳、衡州、宝庆五路策动响应。发动起义的力量，在长沙是以武备学堂学生联络部分军队为主，其他各路，则以哥老会会众为主。

但在起义前夕，由于马福益等会党首领在浏阳、醴（lǐ）陵一带的清军中进行活动时，出入频繁，人多口杂，以致透露了风声，引起清朝地方当局的注意。接着，又有几名会党分子在醴陵车站被捕，供出了起义计划，并说出了这次起义的总领导人是长沙的黄兴。清朝在长沙的地方官吏大为震惊，他们开始严密搜查，并悬赏缉捕黄兴、刘揆一等。

搜捕黄兴的差役已到黄兴的家门口时，黄兴刚巧坐轿外出。差役见了他就问：“你是黄兴吗？”黄兴看到情势不对，就镇静地回答说：“我是来会黄兴的，他家里人说他到明德学堂去了，我要到那里去找他。”于是，差役就跟着他来到明德学堂。黄兴下了轿，假称进去喊黄兴出来，叫差役在门口等候。黄兴进学堂后，就从侧边的小门溜出，躲到一个朋友家里。差役在门口左等右等都没有见人出来，才知道上了当。到了第四天，黄兴坐了轿子，假装那个朋友家里的女眷出外的样子，安全地转移到当时同情革命的一位基督教的牧师的教会里。

黄兴在教会里隐藏了一个多月，待风声渐平，他又化装成海关人员，搭轮船经汉口去往上海。临行前，朋友们嘱咐他到上海后来一电报，以免在长沙的亲友挂念。

黄兴和孙中山一样，在他一开始从事革命活动时，就坚决地选择了武装起义的道路，并不是偶然的。这首先是因为当时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朝专制政府，同中国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特别尖锐，国家民族的命运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这样，就迫使当时的革命者能够义无反顾地投入武装斗争，力图用武装起义将中国尽快地从十分严重的民族危机中拯救出来。其次，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人民没有丝毫的民主权利可言。清朝反动政府顽固地拒绝任何改革，一切温和的改良主义办法都不可能取得任何结果。这也迫使当时的革命者不能不拿起武器，从这里去寻找唯一的出路。再次，中国是一个富于革命传统的国家。中国近千年的历史中，特别是近代的历史中，充满着人民武装反抗反动统治者的英勇斗争事迹。在会党、军队和人民群众中到处都蕴藏着革命斗争的火种。这一切，也有力地鼓舞着当时的革命知识分子，推动他们在从事革命时，就迅速地拿起武器来。黄兴正是这样做了，他做得完全正确。

这次起义计划失败后，黄兴并不气馁，仍然秘密往来于湖南、上海之间，筹划新的起义。在这段时间内，他又经历了不少危险。

当他从长沙逃到上海后不久，就因为万福华行刺清广西巡抚王之春的案件而遭牵连被捕。当时，黄兴已受到清政府的通缉。审问他的人用他的像片对照，因为服饰和胡须有所不同，敌人疑惑不定。黄兴又从容地假托姓名，终于被友人营救获释。

还有一次，他用船只运送军械回湖南的路上被清兵搜查发现。一个清兵向他扑来，他立刻就把那个清兵倒提起来，丢入江中。他的同伴也开枪打死了几个清兵，方才脱险。

虽然，黄兴遇到了一个又一个的危险，但丝毫也没有削弱黄兴的革命斗志。

## 五、边境线上的武装起义

1905年夏天，黄兴在日本东京。恰好孙中山也从欧洲来到东京，倡议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以及其他革命团体，成立一个全国规模的统一革命组织，以便领导全国的革命运动。黄兴经人介绍和孙中山相识后，就积极支持孙中山的倡议。

1905年8月20日，同盟会在东京成立。确立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纲领。孙中山被推为总理，黄兴被推为庶务，成为同盟会中仅次于孙中山的重要领袖。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是中国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发展阶段中的一件大事。它使当时的革命力量有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纲领和统一的革命组织。尽管这个纲领还只是一个很不明确、并不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这个组织还只是一个以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为主干的各种反清力量的松懈的联盟。但是，有了它，同过去终究是不相同了。从此，革命运动就以更大的规模，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了。

同盟会成立后，黄兴仍然把他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发动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上。当时，在中国的留日学生当中，有大批人在陆军学校学习。黄兴以为陆军学生应该在回国后打入清政府编练的新军中去工作，以便逐渐控制清政府的武装力量，把反革命的武装改变成为革命的武装，因而不应在留学期间就暴露出革命的真面目。为此，他特别嘱咐陆军学生中的同盟会会员不和同盟会总部往来，陆军学生的入党证件也由他一个人保管。另外，他又在由陆军学生参加同盟会的会员里，选择一批坚定的可靠分子另组一个团体名叫“丈夫团”，以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作为团员应具备的品德。他准备依靠这批力量，在将来时机成熟时发动起义，夺取政权。

1905年冬，黄兴又化名张守正潜回国内。他曾到广西桂林的清军军营中进行工作，发展了一批原来在清军中的革命分子参加同盟会。

1906年春，黄兴又从桂林经新加坡、香港转赴日本，继续派人回国从事各地的革命组织工作。

1906年底，江西、湖南边界地区的洪江会在同盟会会员刘道一的策动下，发动武装起义，一时声势浩大，起义队伍发展到三万多人。黄兴和孙中山在东京闻讯，极为兴奋，即派同盟会会员多人赶回国内参加领导工作。但是，这次起义在大批清军围攻之下，很快就失败了。刘道一后来也被捕牺牲。江西、湖南边界地区起义的失败，使黄兴极为悲愤，他对刘道一的牺牲，更是悲痛不已。

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可是由于广大的会党群众热烈地响应革命，却进一步推动了同盟会发动武装起义的积极性。但是，由于清政府对长江流域戒备更加严密，孙中山和黄兴不得不相继离开日本到越南的河内准备全力在广东、广西、云南边境一带发动武装起义。

1906年，清朝广西钦州、廉州地方官吏，借举办学校为名，加紧对当地人民进行剥削，除原有的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外，又征收糖捐，规定当地出产的蔗糖，须先缴纳税款才准出售。钦州东部的那丽、那彭、那思合称三那，土地肥沃，农民以种蔗榨糖为业。清政府开征糖捐后，激起群众的反抗。那彭人刘思裕素有反清的思想，一向为本乡人民所敬仰；他极力支持人民的抗

捐斗争，被推为抗捐领袖。

1907年春，刘思裕在那彭圩边的鸡儿坪召开群众大会，痛斥清朝的贪官污吏，鱼肉农民，使人无法继续生存，并当场率众歃血为盟，立誓抗捐到底。这时，黄兴正在越南筹备起义，得到这一消息后，认为利用这次群众抗捐发动起义，是个很好的机会。于是，他就通过钦州地方革命党人为向导，率同志多人进入三那和刘思裕接洽，共同策划起义。这一抗捐运动，在得到黄兴等人的领导后，声势日渐壮大，直接参加斗争的群众达数万人。

三那抗捐运动日益扩大后，清政府派兵前往镇压，但清兵很快就被黄兴和刘思裕所率领的起义武装所击溃。这时清政府又派新军军官郭人漳带兵千余人并附炮队，改由海道至北海登陆，由廉州进攻三那。刘思裕率众战死，抗捐斗争受到挫折。

郭人漳镇压三那人民抗捐斗争后，得到清政府的奖励，升任钦防边防督办。当时黄兴极想攻占钦州，以此作为革命根据地。黄兴因与郭人漳有同乡关系，便亲自到郭人漳营中，劝他起义。黄兴说：“中国衰弱，列强压迫，人民痛苦，如果不革命，就没有复兴的希望。”郭人漳当时表示很感动，立誓黄兴部队一到，他就立即响应，但以后他看到革命力量有限，清政府又有所准备，他就改变了主意。当黄兴率领人马按原订计划进攻钦州时，郭人漳却悔约，背信弃义地向黄兴所部进行攻击，完全打乱了黄兴的计划。起义就这样失败了。

这次起义失败后，黄兴退到越南的河内，和孙中山在一起，准备发动镇南关的起义。镇南关是中国和越南边境的要隘，地势险要，有人把它称之为旅顺口第二。镇南关所在地的山顶上，有三个炮台。孙中山和黄兴认为如果能攻占镇南关及其三座炮台，就可以作为武装根据地，扩大革命的影响。于是，就任命同盟会会员黄明堂等人，从事具体准备工作。

黄明堂出身于武术教头，拳脚功夫很好，在中越交界地区拥有很多徒弟。当时，驻守炮台的清军，已经事先联络好，一旦革命军进攻炮台时，即起来响应。

1907年12月1日（阴历十月二十六日），黄兴派黄明堂等人率领主要由会党分子组成的武装力量百余人，从山后小路爬上去，在炮台守军的响应下，不战而据有炮台。然后，孙中山同黄兴亲自从后山攀登山巅指挥。

镇南关的炮台被革命军占领后，清廷广西当局极为震动，赶派军队大举包围。黄兴最初以为炮台为边防要塞，贮藏的弹药一定很多。但是，在清政府腐败的经营下，库中并没有多少枪枝，弹药也不充足，难以坚持作战。于是，在坚守数天以后，只得主动放弃。

镇南关起义失败后，黄兴认为钦州、廉州地区的会党群众反清积极性很高，可以利用。1908年3月27日，黄兴又亲自率领以华侨中的革命分子为主的武装力量二百多人，短枪轻装攻入钦州地区，坚持游击战争四十余日，给清军以很大的威胁和打击。后因后援不济，终于又败退下来。

1908年4月29日，同盟会又发动了云南河口的起义，攻占了河口。黄兴刚从钦州退回越南，又立即赶往指挥，担任国民军总司令。但是，这次起义的军队还是临时运动起来的会党，不听指挥，不守纪律，进展很慢。后来，黄兴回越南准备购买军械，被法国殖民当局扣留，并强迫出镇。河口的军事无人指挥，不久又告失败。

这一系列的起义，由于没有发动广大的人民群众，只是少数人的军事冒



险行动，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都失败了。但是，它却扩大了革命党的影响。鼓舞了人民的斗争意志。

当黄兴等人在广东、广西、云南边境一带举行武装起义时，留在东京的一部分同盟会会员在搞分裂活动，猛烈攻击孙中山，主张召开大会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另举黄兴接任。黄兴知道后，就去信坚决拒绝。他说：“孙总理德高望重，诸位如果希望革命成功，千万不要误会，还是倾心拥护孙总理好。”这样，才结束了那次风潮。以后，有些人一再鼓动黄兴反对孙中山，黄兴也都顾全大局，维护团结，加以拒绝。

## 六、广州起义前夕

广东、广西、云南边境数次武装起义失败以后，同盟会总结经验，认为失败的原因是由于力量分散，组织不严，准备不周的结果。于是，决定集中全部精力，再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这次起义就是著名的 1911 年 4 月 27 日（阴历三月二十九日）的广州起义。

为了做好这次起义的组织和准备工作，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孙中山、黄兴、赵声等在南洋群岛的槟榔屿举行了专门的预备会议。会后，在香港成立了负责具体领导起义的机关——统筹部，选黄兴任部长，赵声为副部长。

为了筹集资金，1910 年 3 月 28 日，黄兴等人同往新加坡。不久，他们得到从香港来的消息，有人暗杀摄政王载沣不遂。在新加坡筹集资金的同志努力落空后，愤愤不平地回到了香港。

黄兴也感到有迅速回香港去的必要。这时有日本友人从日本打电报给他，约他在香港一晤，说有要事相商。大约同时，黄兴接到香港同志拍来的电报，内称收到了孙中山给他的重要函电。

3 月 28 日孙中山致信黄兴，提出要建立基地以训练革命党人和贮藏从海外运来的武器。孙中山征求黄兴的意见，问他这个计划是否可行。

黄兴在复信中指出，广东省南部的法国租借地广州湾可以用来贮备武器和集合兵员，现已在广州湾找到一个地方，数千之众可以在那里乔装成农民。黄兴指出，寻找一个练兵场所，颇为困难，即使有了地点，如广州湾之类，其活动也必不可免地会引起清政府的注意。黄兴补充说，在革命爆发后，他欢迎外国同情者的帮助。

在这封信中，黄兴指出，推翻清政府的最好力量就是他自己的军队。他分析了广东的形势后断言，尽管以前有挫折，但是，“图广东之事，不必于边远，而可于省会”。因为，广州军队中的革命组织并未全被破坏，新军中的同志尚多。他表示相信：“广东必可由省城下手，且必能由军队下手。”他还分析，广东当局打算从湖南招募一千士兵；他估计这些新兵，在湖南革命党人的影响下，很容易站到革命方面来。黄兴认定，只要资金充裕，事有可为；只要前途有望，后备部队的士兵也易于争取到正义事业中来。

至于其他省份，黄兴分析，在广西军队的军官中，有数十位同志。在江苏、浙江和江西等省军队的军官中，也有许多人是革命者。在湖北军队中，成绩也很好。在云南，同盟会成员已经打入军队，并有一定的力量。一旦一声令下，长江流域的秘密会党必能相助。

黄兴的结论是：革命一经在一省爆发，各省将闻风而动。

革命党人在槟榔屿会后，各自分头积极准备武装起义。黄兴赴缅甸，随后，他又在新加坡呆了一段时间。赵声是返回香港为起义作准备的第一人。12 月 6 日，孙中山赴欧洲作筹款旅行。

在新加坡，黄兴很忧虑，因为他获悉，在马来西亚筹款的同志仅筹集到港币一万元。这时，荷属东印度的募款也不乐观。在绝望中，黄兴决定寻访正在马来半岛作筹款工作的邓泽如。黄兴数次在不同的城市中错过了与邓见面的机会，最后，12 月 31 日，黄兴终于找到了邓泽如。

黄兴对筹款结果的焦虑不安，使邓泽如深受感动。他建议他们再作一次更大的努力，要求黄兴同他一道，亲自向马来西亚的革命同情者呼吁。虽然他的孩子刚刚出生，而且他离家已四十天而返家仅仅一日，邓泽如还是告别

了家庭，立刻和黄兴一道去马来西亚再作一次筹款旅行。

第二天是 1911 年的新年。黄和邓在芙蓉召集了他们的同志。在有该城约三十人参加的会议上，黄兴强调指出了形势的紧迫，并呼吁筹募更多的资金。结果，一位原先答应出资港币一千元商人，当场将数目增为港币五千元。其他的人也都纷纷捐款。

次日，1911 年 1 月 2 日，他们二人赴吉隆坡，但在那里收获很少。像往常一样，那儿的富有的中国人对革命党人十分戒备，对革命事业也不热心。当天晚上，黄兴和他的伙伴们在一所学校的老式校舍中住宿，蚊虫袭扰，不得入眠，于是他们在学童的书桌旁作深夜长谈。

第三天，他们到怡保。在当地华侨领袖举行的宴会上，筹款超过了港币五千元。此后数日，黄兴和朋友们不断活动，到一月七日，筹款总数距原定目标港币五万元已经不远了。一个星期的紧张奔波，收获很大，黄兴既欣慰又深受感动。当月九日，他回到新加坡，三天以后又转去香港。

革命党人筹集款项的总数接近港币十九万元，大大超过了原定的目标。这笔巨款全部是海外华侨，主要是东南亚地区华侨捐献的。

## 七、碧血黄花

1911年1月18日，黄兴从新加坡抵香港。月底，就在香港跑马地35号设立了以他为首，以赵声为副的统筹部，胡汉民负责秘书课。

为了与两湖和长江下游诸省在行动中协调一致，2月间，黄兴派人携款二千元到中国中部，去资助那里已十分活跃的当地革命势力。

在广州，革命党人建立了40多个秘密机关。为了避免因被警察发现而互相牵连，各个机关之间一般都互不知悉。在建立秘密机关时，革命党人必须克服的一个困难是：在广州，租赁房屋要有担保人，而房主一般都不愿把房子租给单身汉。因此，革命党人在广州开了两家米店，充当保证人和介绍人。有的女同志伪装成为别人的妻子或女佣，那时女同志很少，有几处地方，她们必须以家庭主妇的身份出现。因为婚礼提供了一个转运军火的机会，也就缔结了不少这样的“婚姻”。中国的习俗是：新郎在自己家里的迎候新娘，而新娘通常是坐一乘垂帘的花轿来到的。盛放嫁妆的箱笼，也是随送夫家。把枪枝藏在轿椅下部和箱笼里面是很容易的。

武器，主要从日本进的。炸弹是革命党人在香港制造的。从国外购进的军火，首先运到香港，然后通过不同途径运到广州。子弹则密藏在假发内，或者藏在装染料的锡罐里。这些都经常作为货物运到广州，有时也由同志们亲自带到广州。

为了这次起义，同盟会总部从各省、南洋和留日学生中调集了大批的优秀骨干，并组成了有工农群众参加的一支800人的先锋队（即敢死队）。先锋队队员大多来自四川、福建和东南亚，统由黄兴指挥。赵声所部几乎全部来自江苏和安徽。4月中旬，大多数人都已到达香港，并开始源源输入广州。革命党人组织的敢死队担任首先发难的责任；同时革命党人还联络新军、防营和会党，以备响应。为了这次起义，除在广州积极准备外，并派人到广西和长江流域各省广泛发动。计划一举攻占广州，然后分兵两路北上：一路出湖南，进攻武汉；一路出江西、向南京推进，会师长江，继续北伐。

起义的具体准备工作，是在紧张而热烈的气氛中进行的。从各省和留日学生中调集的骨干分子，他们辞父母，别妻子，抛学业，历尽艰苦，赶赴香港统筹部报到。负责转运军火的，想尽种种办法，冒着生命危险，把军火从香港运到广州城里的秘密机关。负责策动敌人军警反正的，利用各种关系，打入敌人的内部，秘密地进行宣传和联络工作。黄兴的儿子黄一欧，就是在黄兴的指派下，为了运动巡警响应起义，而考入广州巡警教练所当学员的。

发难日曾拟议在1911年4月13日，但是，4月8日，从马来西亚归来的同志，不跟任何人打招呼，就在白天枪杀了广州副统。由于广东当局在这次暗杀后更加严密戒备，也由于一批军火和汇款未到，起义时间只好推迟到4月底。

有一段短暂的时间，形势看来对革命党人有利。一个新任协统和一个新任标统都是黄兴的老朋友。这个协统是东京同盟会最早的成员之一。在士兵中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宣传和组织工作。每一个参加革命组织的人都发给一块银洋，要呈缴相片一张。士兵们被告知，他们的相片将送交香港统筹部，使他们革命者的身份更加确凿有据。但事实上，为了免于落入警察之手，这些相片立即销毁了。

1911年4月23日傍晚，黄兴由香港潜入了广州，把总指挥部设在清朝

两广总督衙门附近的小东营5号，身入虎穴，直接指挥。

广州当局对起义者的计划并非毫无所知。在成效显著的筹款活动之后，起义计划在新加坡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清王朝在那里的情报人员，向政府报告了革命者准备起义的事情。广东当局对于起义已经知道，他们所不知的仅是发难日期而已。

广州的起义者曾决定在4月26日举事。黄兴来广州后，把日期推迟一天，因为有的军火未到。这时，清两广总督张鸣岐飞调防勇二营，严密设防。少数领导人认为敌人已经戒备，主张缓期发动起义。黄兴认为此次起义，全党已全力以赴，南洋、日本、内地同志不远千里而来，现在形势危迫，万不能畏缩不前，使其前功尽弃；且军火都已入城，难再运出，如果中途缓期，万一不能再举，必然使人认为是欺骗行为，断送了以后的革命饷源。最后，黄兴表示自己早已下定必死决心，愿意集合同志数十人和张鸣岐死拼，以谢国人，而保持革命党人的名誉和信用。

大多数人听说有人主张缓期，都极为愤慨，纷纷找黄兴表示反对。于是，黄兴遂下令决定于4月27日下午5时半发难。但是，由于一再改期，一切部署都乱了。更重要的是人数大减，不得不放弃10路进兵的计划，改为集中全力攻打总督衙门。

计划发难的当天早上，黄兴向南洋党人发出表示准备牺牲的绝笔信：“本日当驱赴阵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书此以当绝笔。”

4月27日午后4时许，参加起义的队伍在黄兴的机关部集合了。他们穿着橡胶鞋。有的同志已是中年人了，但仍力争加入敢死队，黄兴只好发给他们每人一支手枪。

4月27日（阴历三月二十九日）午后5时半，广州起义爆发了。黄兴率领同志百余人，由小东营5号总指挥部出发，直奔总督衙门。参加起义的同志，人人手臂上都缠有白毛巾一条，作为标记，一手拿手枪，一手拿刀，炸弹都装满了口袋，有的人脖子上还挂着一筐子炸弹，在螺角的军号鸣鸣声中，飞步前进。冲进总督衙门以后，遇到一些卫兵，黄兴就喊：“我们都是同胞，不要打……你们如果赞成，就请举手。”有些卫队进行抵抗，黄兴率众还击，卫队不支，纷纷弃枪投降。

黄兴攻占总督衙门以后，才发现张鸣岐军已逃亡。等到黄兴再带队走出衙门后，清军大队人马已经赶来，黄兴率同志们英勇抵抗，很多人中弹牺牲，黄兴右手扳枪机的中食二指第一节也被打断了，但他仍忍痛用断指第二节扳枪机射击。后来敌人渐渐合围，他遂下令分二路突围，他自带一队奋勇冲杀，且战且走，队伍逐渐散乱。直到最后剩下他一个人，才避入一家小店，换了衣服，逃到一位女同志徐宗汉家，由她护送，退到香港。以后他俩就因此关系而结成了夫妇。

这次起义，战斗一直延续到第二天早上。在起义的当天晚上，参加起义的革命党人都英勇战斗，不畏牺牲。他们在寡不敌众的艰苦战斗中，有的壮烈牺牲，有的受伤被捕后英勇就义；没有牺牲和被捕的，也是经过了激烈的奋战之后，才退出战斗。

这次起义，死难的烈士共有七十二人，合葬在广州黄花岗，被称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民国成立后，黄兴为烈士们写了挽联：“七十二健儿，酣战春云湛碧血，四百兆国子，愁看秋雨湿黄花。”

同盟会为了这次起义，虽然经过了长期的准备，集中了财力和物力，参

加起义的同志也都表现出英勇的革命精神，但是，它仍然是一次没有发动广大群众参加的、没有把握的军事冒险行动。因此，终于无法避免最后失败的命运。这次起义使同盟会丧失了大批的优秀干部，它的领导力量也大大削弱了。黄兴曾因这次失败一度灰心，著名的革命活动家赵声也忧愤死去。但是，这次起义却给清政府以严重的打击，烈士们的鲜血激起了人们的斗志，直接促进了革命高潮的到来。黄兴是这次起义的直接领导人，他在这次起义中，又表现了勇敢无畏的革命精神，因此，他在国内赢得了很高的声望。

退居香港的黄兴，经过总结后，主张在长江沿岸，特别是武汉搞武装起义。他在给友人谭人凤的七律诗中表达了这一意思：

怀锥不遇粤运终，露布尽传蜀道通。

吴楚英雄戈指日，江湖侠气剑如虹。

能争汉上为先著，此复神州第一功。

愧我年来频败北，马前趋拜敢称雄。

## 八、武昌起义

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是10多年来人民群众对清政府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下出现的。

戊戌政变以后，慈禧太后亲政，倒行逆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反动的时期，因而爆发了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唤醒了全国人民，它标志着中国人民对于清王朝的态度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要求改革的呼声遍及全国。对此，清政府发现，装聋作哑是有困难的。其后10年，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但许多中国人逐渐认识到，整个改革运动，只不过是用以避免内部暴乱的权宜之计而已。人们认定，清政府专图一己之利，决不可能实行根本性的变革。广大人民的处境日趋穷困悲惨，各地“抢米风潮”蜂起，1910年的长沙抢米风潮，是其最著者之一。农民抗租行动遍及各地乡村。1911年，反政府的情绪由于铁路国有化计划而更趋高涨。

1911年5月，清政府从外国银行理事团获得一笔借款，修筑从汉口到广州和四川的铁路。消息传来，广东、湖南、四川的人民和商绅群起反对。最强烈的抗议来自四川的商绅，因为他们早已组织了自己的铁路公司，来修筑四川省的铁路。他们愤慨万分，分设保路会，开始有组织的反抗。他们召集会议，散发请愿书，鼓动商店罢市，还抗租抗税。整个八、九两月，风潮汹涌，山雨欲来，形势日趋严重。政府企图以武力镇压，结果却使反抗更为激烈。

1904年至1911年之间，在湖北省有许多地方性的革命组织，它们都是由学生和军人创建的。

科学补习所是湖北的第一个革命组织，它与黄兴的华兴会关系密切，因为参预1904年流产的长沙起义而被解散。其后继者日知会，是同盟会湖北分会的外围组织。1906年冬天，由于该会会员参加了萍浏醴起义，也同样被清政府取缔了。在此以后的一年半中，湖北的革命运动处于蛰伏状态。

1908年夏，原日知会成员再趋活跃。12月中旬，群治学社成立。这个组织仅仅从新军中吸引成员，它公开宣称的宗旨是，提高会员的教育程度和自治能力。它的成员中几乎没有军官，因为军官不为士兵所信任。

紧接着1910年4月的长沙抢米风潮，湖北的革命党人试图在两湖组织一次暴动，但湖北当局发现了这个密谋，起义的领导者们逃离该省。

1910年夏末，群治学社的成员决定组织一个新的团体，这个团体称为振武学社。一月之内，入社社员就达240多人。所有这些会员，都是新军的士兵。不久以后，振武学社的某些领导成员，包括它的湖南籍的社长在内，都由于被怀疑有颠覆活动而被逐出军队。这就妨碍了振武学社的活动。

1911年1月30日，振武学社改组为文学社，蒋翊武任社长。

当时湖北还有另一个重要的革命组织，即共进会。共进会宣称，在推翻清王朝的共同事业中，寻求其它革命党人的合作。共进会中最活跃的成员来自四川、湖南和湖北。他们继续保留同盟会的会籍。例如，共进会一个部的部长焦达峰，参加了1908年下半年黄兴在东京组织的军事训练活动。

孙武和焦达峰先后于1908年末和1909年初从日本回国之后，共进会在湖北开始活动。孙武曾是科学补习所的成员，在湖南和湖北当过军官。1908年，他打算到云南河口去参加黄兴的起义，但是，当他到达香港的时候，云南起义已经失败，黄兴也离开了。于是，他转赴日本，在日本参加了共进会，

并被选为军务部长。1909年秋末，他在香港参加了同盟会。1910年夏，孙武回到湖北，在该省为革命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

广州起义失败后，湖北的革命党人为广州同志们的英勇行动所激励，急欲闻风而起。有些同盟会会员，也早就主张在长江流域发动起义，特别是包括武昌、汉口和汉阳在内的武汉地区。为了指导革命活动，他们需要一个地区性的组织。于是，中部同盟会于1911年7月13日在上海成立，它的主要任务是在长江流域发动革命。执行部的部长们向黄兴报告最新的情况发展，并经常征求他的意见。

鉴于自己的经验教训，黄兴向同志们建议，要“严剔内部之人”，以免侦探混入。他认为，作为中部同盟会组织原则的参议体制值得考虑，他主张建立铁的纪律。

中部同盟会成立后，长江流域革命运动空前活跃。至此，湖北的两个革命团体——共进会和文学社——联合起来，已是势在必行了。

湖北的事态迅速发展。从9月底起，武汉三镇当局就获悉，革命运动正在进行。三镇到处谣传，说起义即将爆发。关于起义时间，曾经定过几个不同的日期，但都不是正式决定。

10月9日晨，因军事勤务赴岳州的蒋翊武回到武昌。他从同志们那里了解到，黄兴为了赢得时间组织各省同时行动，建议起义延期。他也被告知，黄兴肯定正在赴沪途中。蒋翊武召集同志们开会。他说，在湖北开始行动之前，稍待形势的进一步发展，是比较适宜的。

随后，蒋翊武获悉，当天上午，在汉口俄租界的革命机关部，偶然爆炸了一颗炸弹。孙武在这次意外事件中受了伤，警察搜查了机关部，逮捕了几个革命党人，抄获了一些印章、宣言和革命文件。这个案件立即移送到武昌巡警道。在此情况下，蒋翊武被迫改变他原先的决定，下午5时，他以临时总司令名义发布命令，午夜采取军事行动。

午夜到了，但通知起义行动开始的信号没有发出。由于某种原因，负责此事的同志未能完成任务。当晚，湖北当局搜查了武昌的若干革命机关。多人被捕，枪枝、子弹和制造炸弹的炸药被查抄。蒋翊武仅以身免。次日清晨，3个被捕的革命党人壮烈殉难。谣言四布，说是警察当局已经查获了参加革命组织的士兵名单。在新军中的同志人人自危，再也不能坐以待毙了。于是，指挥部决定当晚采取行动。这样，十月十日的武昌起义爆发了。

当时，大约有25营清军驻扎在武昌及其近郊，人数估计为15000至18000之间。由于四川保路风潮扩大，清廷调了一部分湖北新军入川镇压，造成革命的新军士兵多数调离湖北，所以起义时倾向革命的全部兵力只有5个营，约2000人左右。

次日午前，革命党人攻下武昌。10月12日，民军初胜之后，实力增强，人数大增，相继光复了汉阳和汉口。此时，湖北军政府接连向上海发出电报，要求中部同盟会的领导者们来湖北，并敦促黄兴速来武昌。



## 九、搏战汉阳

广州3月29日之役之后，只过了几个月，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就由于革命党人潜入清政府新练的陆军中，进行了长期艰苦细致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几乎控制了武昌的全部新军，所以起义发动后，很快地就占领了武汉三镇，取得了起义的成功。

武昌起义后，清政府极为惊恐，不得不起用掌握着北洋陆军实力的袁世凯，集中了它的精锐部队猛攻汉口，局势十分危急。

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黄兴接到宋教仁促他北上的电报，心情十分激动，立即启程去上海。10月25日就从上海动身赴武昌前线，他换装混在开往武昌战地的红十字救伤队中，躲过了沿江各口清军的严密稽查，于10月28日安抵武昌。都督黎元洪知道黄兴当时在人民中有很高的威信，就立即派人拿了一面大旗，上写“黄兴到”3个大字，骑了一匹马，在武昌全城和汉口没有被清军政府攻陷的地方跑了一圈，武汉人心大定。

黄兴到武昌后，听说汉口战事紧急，就立即赴汉口指挥。各军听到黄兴亲来前线，士气大振。这时，汉口的革命军和清军已相持10余日。黄兴重新部署后，连日反攻，夺回了几处阵地，但却不能固守。敌人见汉口久攻不下，就纵火焚烧市街房屋，以致全市大火，军队无法立足。于是，黄兴不得不将军队撤到武昌。黄兴回到武昌后，召开军事会议，分析了战事失利的原因，决定先撤出汉口，固守汉阳，待湖南援军开到，再反攻汉口。

11月3日，湖北军政府召开各军代表大会，在武昌阅马厂举行“登台拜将”的隆重仪式，任黄兴为湖北军政府战时总司令。黄兴发表了就职演说，士气大振。

这几天，除了零星炮战外，前线是平静的。经过汉口之战，双方军队都需要时间休整。占领汉口后，清政府下令军队停止前进，希望同革命党人进行谈判。黄兴利用这个空隙整编部队，并制订保卫汉阳的战略。

黄兴在汉阳统率的部队包括：三个协和一个团的步兵，一个炮兵营，一队工兵，以及湖南援军两个协。据清军估计，汉阳的总兵力为13000至14000人。

黄兴就任战时总司令后，立即出发汉阳，布置防务。当时，革命军与清军双方兵力相差甚远，而且各队新兵大多，未受过训练，作战仅凭勇敢，指挥十分困难。黄兴到汉阳后，把司令部设在昭忠祠，利用汉阳兵工厂的铁板、木材，率领军队日夜构筑防御工事，坚守汉阳。当时革命军召募数千群众挖掘战壕，防御工事甚为出色，清军指挥官在其军事报告中，也对此表示惊奇。当时黄兴的儿子正在上海组织革命军队，曾接到黄兴的来信，拆开一看，信上只有8个字：“一欧爱儿，努力杀敌。”

11月中旬，革命军准备反攻。黄兴召集参谋会议，决定为夺回汉口作好准备。16日下午，队伍待命出击。当晚，他们渡过汉水，胜利建立了滩头阵地。但是，他们遇到了猛烈抵抗，经过近24小时的连续战斗，革命军已无法继续坚持。17日下午，他们开始向汉阳撤退。

此战，革命军损失很大：75名军官和792名士兵阵亡或负伤。黄兴在撤退中也几乎丧生。一个敌兵在黄兴背后很近的射程内正准备向他射击。这时有人高呼报警，黄兴回转身来，一刀把敌人刺死。

这次战斗后，黄兴采取了防守战略。清军企图将革命党人逐出汉阳。11

月 20 日，清军的反攻准备就绪，进攻的主力是冯国璋指挥的北军第四师，兵力近 1 万人。把向邻近地区陆续增援的部队计算在内，清政府在武汉地区动员的精锐部队共达 3 万人左右。在国内其它任何地方，清政府都没有集中过这样强大的兵力。

11 月 20 日和 21 日，双方开始了作最后一周的主力决战。刚一接火，革命军就不能与清政府的优势兵力匹敌。25 日，战局已岌岌可危，黄兴命令把汉阳兵工厂的枪枝弹药运往武昌，以免落入敌人之手。26 日，革命军的战略据点都已失守。黄兴接连数日挥兵御敌，顾不上休息，这时已十分疲劳，心情也十分痛苦。

11 月底，汉阳在清军优势兵力猛攻之下失陷，黄兴不得不退出汉阳，乘船回到武昌。行至中流，他看到汉阳为清军进占，极为悲痛，愤怒欲投水自尽，幸为左右营救。接着，黄兴离开武昌，回到上海。

汉阳之战，充满着革命党人舍身捐躯的英雄事迹。在 9 天的战斗中，革命党人军官阵亡者 137 人，负伤者 85 人；革命士兵 2693 人阵亡，400 多人负伤。在此期间双方伤亡总数估计约达万人。

黄兴在这次战斗中，在敌我兵力极为悬殊的情况下坚守汉阳 1 个月，虽未能取得胜利，但却保住了武昌的湖北军政府，争取了时间，促进了全国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

## 十、民国成立

当黄兴从武昌回上海时，全国已有许多省份继武昌起义之后宣告独立。

汉阳陷落后，武昌局势一片混乱。清军不时隔江发炮轰击。12月1日，一颗炮弹命中了军政府办公楼，黎元洪吓得逃离了武昌。从战略角度来看，没有了汉口、汉阳这两个城市作为屏障，武昌是难于防守的。所以，湖北军政府当局听到英国驻汉口总领事出面斡旋，建议停火3天的消息后，真是喜出望外。停战达成了协议，并曾多次延长，重申有效，而且推及全国其他地区。

12月1日，黄兴抵达上海。早在11月初，上海及其郊区就在革命党人的领导下光复了。

12月2日，江、浙联军经过短暂的战斗之后，攻占了南京。南京的光复比汉阳的失守只晚4天，它抵销了起义者在武汉的重大失败，重新提高了革命党人的威望。革命力量的中心，从四面受敌的武昌转移到了南京。

随着越来越多的省份宣布脱离清廷，革命党人日益感到有必要成立一个临时政府。11月7日，黎元洪通电各省革命当局征询意见。为了取得各国列强的承认，并联合起义各省一致行动，建立临时中央政府是事不宜迟的。

上海的军人集团，试图把革命中心这种有利地位从武昌转移过来，建议各省派代表到上海。

11月15日，代表们举行了第一次会议，组成了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5天后，宋教仁和其他5省代表从上海打电话给黎元洪和黄兴，对以湖北军政府作为民国中央军政府事表示承认。

12月1日黄兴到上海。2日，南京光复。4日，上海、江苏、浙江3都督与留沪的各省代表举行会议，决定临时政府设于南京，并公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兼湖北军政府都督。这个决定立即电告了湖北和各省当局。第二天，在上海的代表们通过一项决议，责成大元帅负责筹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12月26日，各省代表联合会接到黄兴从上海发来的电报，他力辞大元帅之职，因为他接到了孙中山即将回国的电报，就不去就职，说：“孙先生是同盟会的总理。他没有回国，我可以代表同盟会。现在他已在回国的路上，如果我抢先就职，会引起误会。太平天国起初发展很快，后来就是因为几个领袖争权夺利，造成失败。革命同志最要紧的是团结一致，才有力量打击敌人。要团结一致，就要不计较个人权利，互相理解。”

孙中山获悉武昌起义爆发时，正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城。他没有直接奔回祖国，只是前往欧洲，因为他认为，“此时吾当尽力于革命事业者，不在疆场上，而在樽俎之间，……故决意先从外交方面致力。”所以孙中山从纽约前往英国，后来又到了法国。

孙中山在革命运动中的领袖地位是不容置疑的。他回到上海后，立即组织召开同盟会领导人会议。

黄兴对孙中山是全力支持的。12月27日，他亲到南京，向各省代表联合会提议，政府组织采用总统制。12月28日，各省代表提名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

1912年1月1日晨，孙中山离开上海去南京，当晚在南京举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废除阴历，正式采用阳历，1912年定为民国元年。1

月3日，黄兴被任命为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负责整个军事指挥。

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是革命的一大胜利，但革命的危机也同时迅速地发展着。这时，领导革命的同盟会已经瓦解了。很多同志认为只要推翻清朝，建立了民国就算革命成功。他们希望赶快结束革命，好享“共和”之福。有些革命党人很快地就和原来反对革命的立宪党人勾结在一起，忙于争权夺利。而大批的立宪党人和旧军阀、官僚，在武昌起义后，看到清政府已不可能继续存在下去，就摇身一变，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共和主义者，混入革命队伍，窃取权位。这样，就使新成立的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成为一个包括革命派、立宪派和旧官僚三种政治势力的混合政府。革命派在政府中虽居于领导地位，但立宪派和旧官僚却担任内政、实业、交通等部的总长，拥有很大的实力。独立各省的地方政府，也多数为立宪派和旧官僚所控制，孙中山身为临时大总统，但事实上对他们并不能行使中央政府的权力。

很明显，像这样的一个政府，当它受到帝国主义和袁世凯等中外反革命的联合进攻时，就不得不被迫一步一步和反革命势力进行妥协，开始了“南北议和”。

在议和过程中，袁世凯暗示只要南方选他为第一任大总统，他就可以逼迫清帝退位，建立共和政府；南方则暗示袁世凯，只要他促使清帝退位，改专制为共和，就可以考虑选举他为第一任大总统。事实上，双方代表对此都早已心中有数。

对于这样一个会谈，孙中山是很不同意的。他主张继续战斗，趁全国人民倾向革命的时候，多费些气力，扫除障碍，在新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国家。但在这个问题上，黄兴却和孙中山发生了分歧。

黄兴认为，革命的目标就是推翻清朝，建立中华民国，因此，只要当时掌握清朝实际军权的袁世凯承认这点，就不妨把大总统让给袁世凯。他说：“袁世凯是一个奸猾狡诈，敢作敢为的人。如果满足他的欲望，他可以帮助我们推翻清朝。否则，他也可以像曾国藩替清朝出力把太平天国搞垮一样，来搞垮革命。只要他肯推翻清朝，我们给他一个民选总统，任期不过几年，可以使战争早停，人民早过太平日子，岂不甚好？否则，他会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如果不能战胜他，不仅得不到整个中国，连现在光复的土地还会失去，也未可知。”这是黄兴妥协性一面的再现。原来在历次武装起义中，都表现得十分坚决勇敢的黄兴，为什么会要求妥协呢？这并不是偶然的。

黄兴像当时很多资产阶级的革命家一样，把革命的目标局限于推翻清朝专制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现在清朝既已崩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已经成立，他认为多年追求的政治理想就要实现了。这样，在他面前就失去了继续革命的要求和目标，失去了前进的努力方向。他认为只要尽快地把一个统一的共和国建立起来，人民就可以长享共和国的幸福了。而袁世凯所宣传的只要选自己做大总统，他就强迫清帝退位，使黄兴对袁世凯发生了幻想。因此，他就认为推袁世凯做大总统，再用袁世凯的力量胁迫清帝退位，是一个既稳当而又少牺牲的捷径。

黄兴的妥协性，表明了资产阶级革命家脱离群众，对群众不信任，甚至害怕群众起来斗争，因此，就使自己在强大的反革命势力面前，不能不感到自己软弱无力，失去斗争的信心。黄兴在武昌起义前，就曾害怕长江流域群众自发斗争的高涨形势，怕群众的自发斗争会造成天下大乱不可收拾的局面。武昌起义后，人民群众的民主精神的高涨，更使黄兴害怕革命继续发展

下去，有使整个旧有的社会秩序全面瓦解的危险。既害怕群众，不敢发动群众继续革命，就必然感到自己软弱无力。这样，也就决定了他在袁世凯反革命武装恫吓的面前，不能不走上妥协的道路。

总之，黄兴这时在政治上所表现出来的妥协性，正是当时领导革命的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的具体表现。

由于黄兴以及同他持一样见解的人，在当时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中占有大多数，再加上当时混入临时政府的立宪党人、旧官僚军阀，早已和袁世凯暗通声气，阴谋推袁世凯上台，阻止革命的进一步发展。而一切帝国主义者又都极力支持袁世凯，把他看作代替清政府的新的代理人。这样，在当时就造成了一种各方面几乎没有不赞成议和的“舆论”。最后，孙中山只得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务，以清帝退位为条件，改举了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于是，辛亥革命的果实，重新落到了代表大地主、大买办利益的袁世凯手中。

## 十一、二次革命

袁世凯窃取政权后，有一段时间，黄兴对他抱有很大的幻想。

南京临时政府结束后，黄兴担任南京留守统率南方革命军队，黄兴未能及时识破袁世凯的阴谋，反而存有一定的幻想。他认为，民国一建立，多年来奋斗的夙愿已经实现，只要袁世凯赞助共和，就可以支持袁世凯当大总统。因此，他一面为南北调和奔波呼吁，同时极力主张政党内阁，希望以此来制止袁世凯的专制倾向。

这时，袁世凯虽然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从清朝的一个大军阀摇身一变而成为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但他的政权还不够巩固。他为了集中权力，迫切地需要削弱和控制南方的革命武装，以便在条件成熟时进一步扼杀革命力量。

出于这种想法，袁世凯就采取各种办法，胁迫黄兴解散南方的革命军队。他一方面不发南方军队军饷，另一方面又借口南北已经统一，国民希望和平，应该裁军，以减轻人民负担。其真正目的，是为了巩固他自己的势力。黄兴对袁世凯的这一阴谋，几乎完全丧失了警惕，他同意了袁世凯的要求，并且为了表示和平诚意，将南方的军队大加裁减。不久，他又辞去了南方留守的职务。后来，他曾写诗感慨万端：

卅九年知四十非，大风歌好不如归。

惊人事业随流水，爱我园林想落晖。

入夜鱼龙都寂寂，故山猿鹤正依依。

苍苍独立无端感，时有清风振我衣。

黄兴到北京和袁世凯会谈，又竭力表示对袁世凯的信任，并劝说袁世凯加入由同盟会改组的国民党。袁世凯虽然没有参加，但他的亲信、代理国务总理赵秉钧还是参加了国民党。黄兴对这一点十分满意，认为这样就可以实行他“南北一家”的理想了。但事实上，袁世凯的这一做法，只是为了欺骗革命党人，争取时间，从事反革命军事准备的“缓兵之计”。

1913年3月，当袁世凯认为他的反革命政权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支持下已经巩固，军事上也已有把握击溃在南方的国民党残余武装力量的时候，他就派人在上海车站暗杀了国民党的重要领袖宋教仁，首先向国民党发动进攻。这样，袁世凯的反革命面目就完全暴露出来了。

宋教仁被刺以后，孙中山主张立即起兵讨袁，但黄兴反对。他认为当时民国元气没有恢复，南方军事准备不够，袁世凯的假面目在群众中还没有完全暴露，起兵讨袁没有把握，主张采用单纯的法律办法，同袁世凯斗争。

6月间，袁世凯借口赣、粤、皖3省国民党都督曾通电反对善后大借款，是服从中央，下令免职，接着派兵南下，发动荡平南方革命力量的内战。革命党人被迫仓促应战。

7月12日，原江西都督李烈钧起兵讨袁，“二次革命”爆发。14日，黄兴到了南京，召集军事会议，决定出兵计划。第二天，他被举为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通电誓师，电文中说自己“深悔待时留决之非，幸有急起直追之会，当即誓师北伐，殄此神奸”。形势对革命党人极其不利，对此黄兴十分清楚。为了捍卫民主共和制度，他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决心“伸同胞之义愤，去全国之公敌。”讨袁战事一开始，南京方面的部分军队就被袁世凯收买，发生内变。扼守临淮关的第八师返宁防守后，在徐州与袁军对垒的部队因此后

路空虚。22日，徐州失守，袁军乘机南下。25日，江西湖口被袁军占领，李烈钧败退。上海讨袁军又屡攻制造局不下。黄兴在南京饷械不支，声援又绝，面临三面受敌的危险，只得于29日乘日本轮赴沪。

但事实上，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当时并没有很好的准备，他们在南方裁留的几支军队，并没有很好的训练，在群众和士兵中也没有很好地进行革命的宣传和发动工作。黄兴到南京后不久，认为大势已去，就悄悄离开了南京。不久，江西、安徽等省的讨袁部队，也相继为袁世凯击溃，这个“二次革命”很快就失败了。

## 十二、壮志未酬

讨袁军事失败后，孙中山、黄兴等只得东渡日本。他依然坚持民主共和思想，为反对袁世凯帝制复辟作了不懈的努力。1914年春，黄兴在日本东京创办“浩然庐”，研习军事，亲题匾额：“大盗窃国，吾辈之责。”又设立政法学校，培养政治建设人材。当时，孙中山总结失败教训，认为讨袁军事发动过迟，坐失时机；并且认为党内精神涣散，行动不一。因此，他发起另组中华革命党，原来国民党的党员，要求参加中华革命党的，都必须宣誓服从他的统率，并且在誓约上盖手印。黄兴一面还认为当时并不适宜立即发动武装起义，应该从培养人材特别是军事人材着手，慢慢地搞；另一面又不赞成另组中华革命党的做法，认为这样就不能团结更多的力量。他拒绝参加中华革命党，并且在1914年夏离开日本，远走美国。

黄兴到美国后，在华侨中做了一些反对袁世凯的政治宣传工作。1915年，袁世凯称帝，他在海外进一步联络同志，宣传反袁，并且为云南护国军劝募军费。当时，国内很多人都催他早日回国。他就在1916年5月由美国回到日本。到日本后不久，袁世凯死了，他就回到上海。

袁世凯死后，1916年7月8日，黄兴由日本回到上海。他和孙中山合作，共商建国大计。不久，因操劳过度，胃溃疡病复发，致使胃血管破裂，于10月31日去世，时年42岁。1917年春，安葬于湖南长沙岳麓山。

黄兴去世时，各界人士纷纷吊唁哀悼。孙中山先生领衔组成治丧委员会，并破例单独签名发布讣告，还亲撰一副挽联，以寄哀思：

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纵九等论交，到古人此才不易；

试问夷惠谁贤，彭殇谁寿，只十载同盟，有今日后死何堪！

孙中山的挽联，是孙、黄二人战斗友谊的真实写照，也是对黄兴为中国的独立、自由和统一而奋斗的一生的中肯评价。



### 十三、黄兴的一生

黄兴的一生，是资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在他的身上，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家积极的一面，也反映了他们消极的一面。

黄兴是在 20 世纪最初几年开始他的政治活动的。当时，中华民族正面对着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广大的人民包括一批新兴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承受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沉重压力。他们强烈地憎恶这些反动势力，要求寻找新的出路。许多人更进一步觉醒起来，走入民族民主革命的行列。这是黄兴参加革命、并且在前期有着许多积极表现的根本原因。

但是，他同当时许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样，出身于封建家庭，接受的是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代表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是软弱的，因而，就带来他在政治上的软弱性。在革命取得一定程度的胜利后，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北洋军阀的强大压力下，又容易动摇和妥协，不能把革命坚持到底。这就是黄兴在辛亥革命后政治态度发生变化，妥协性在他身上逐渐取得主导地位的原因所在。

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重要领袖，黄兴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民族民主革命中，进行过英勇的斗争，立下了不少的革命功绩，这是值得我们纪念的。但是，在他身上显示的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某些弱点，也是应该给予批判的。

